

中美两国建交后

邓小平“提前”访美内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在《瞭望》新闻周刊第 4 期撰文说,我们正在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 30 周年。中美两国建交后第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就是邓小平副总理 1979 年 1 月底 2 月初对美国的访问。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宏图大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并有利于从国外引进资金和技术,开拓国际市场,使中国的开放政策得到充分实现。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在正常化后抓住势头,迅速充实

中美关系的具体内容,使两国关系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要这样做,在中国方面没有问题,但在美国方面却是有限力的。关于中美建交的谈判是极其秘密地进行的,卡特总统只是在发表建交公报前几小时才向国会领袖打招呼,用首任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的话说,《建交公报》一发表,美国国会炸开了锅。美国国内反对中美建交的势力相当强大,他们很可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仍然十分脆弱的两国关系的发展受到阻碍。对于这股逆流需要加以遏制。许多美国人即使不反对

建交,但中美对抗隔绝了 20 多年,他们对中国非常不了解,对于两国建交的意义也认识不足。对于广大的美国民众需要加强沟通。本来卡特总统以为邓小平会在 1979 年 6 月访问美国,但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小平同志在建交后不到一个月就出访美国。

在 8 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与卡特总统进行了深入、坦率、诚恳、亲切、极其有益和建设性的会谈,走访了国会,会见了国会两党领袖,与国会议员共进早餐,出席了众多的活动,还接受了美国三大电视网和公共广播公司的采访。邓小平的形象通过

电视转播进入千家万户,这是 30 年来的第一次,这种影响力对于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重要的。

这次访问还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国确实是开放了。虽然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宣布了改革开放,但国外对中国会如何实行改革开放还持观望态度。通过邓小平的访美,通过他在美国与各界的交流与对话,通过他对改革开放政策的阐释,国际上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无疑有了新的理解。

(摘自《报刊文摘》)

1999 年:鲜为人知的阅兵故事

1999 年阅兵前夜,一场大雨让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新良一夜未眠。10 月 1 日凌晨,李新良与万名阅兵官兵冒雨进城,到了早上,北京碧空如洗,李新良如释重负。

受阅徒步方队经过时,在观礼台上的全英华人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单声从位置上望下去,“一排人感觉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得不得了”。10 年过后,忆起往事,单声仍历历在目,激动不已。“那是做给美国人看的,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军队多么雄壮,多么有纪律。美国人看得傻掉了”。是年 5 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美军导弹袭击,3 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

单声所说的美国人是坐在他身旁的美国武官。“他告诉我,从没见过这么整齐的画面,非常惊讶。”单声回忆。令这位美国武官难忘的还有中国加油机从头顶越过的镜头。当一架大型空中加油机拖着两根长长的加油管与两架受油的歼击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时,观礼台上掌声雷动。在当时,中国已成

为世界上掌握了研制生产空中加油机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

那天,总共有 132 架飞机从 5 个机场起飞,飞行 70 余公里到达天安门广场上空,一秒不差地依次飞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李新良回忆:“这不同于地面方阵啊!飞机是在天上飞的,早来晚来都不行,这么多架飞机,不同机种,指挥起来难度非常大,没有细致严密的组织和刻苦严格的训练,是绝对达不到那种效果的。”

地面车辆的表现同样惊艳。受阅方队单车在 100 米距离上的误差不到 0.2 秒,距离误差控制在 0.02 米以内。新中国成立后的 12 次阅兵,这是最优秀的一次。时间误差和距离误差一直是世界车辆阅兵难题,而美国、俄罗斯等国阅兵的单车百米误差都在 5 秒和 0.5 米以上。当时负责车辆方队技术测评的工程师张一平回忆,为了解决车辆受阅误差问题,中国以往阅兵采用靠人工拉绳测距、纠偏和考评的方法,但这种手工方法精度不高。车辆方队指挥部发明了“电子监控与

考评系统”。系统由主控机、摄像机、监视器、计算机、录像机等设备组成,车辆方队的行进状况,通过激光传感器传到监视器,再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可对车辆方队的标齐——排面;卡距——前后车距离;方距——两个方队之间的距离;列距——车与车的间隔等进行全方位检测,数据的精确度达 1‰。

张一平说,过去用人工拉绳测距、考评需 101 人,使用这套系统仅需 3 人。刚开始,这套系统对阅兵的全部车辆方队测评时,有 30%的车辆不能达标,经过两个多月的纠偏训练,达标率已达到 99%。

一位观摩中国 50 周年阅兵的华侨告诉单声,能看一次阅兵,这一生一世就满足了。很多观众满足的背后是中国军人付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和泪水。曾采访过 1984 年、1999 年两次阅兵的新华社摄影记者王建民回忆说,训练强度很大,“腿上绑砖头、沙袋练力量;背上绑十字架架练体形;衣领别大头针纠正摆头

定位时出现的仰头、探头、低头;帽顶朝下顶在头上踢正步练平稳、不稳就会掉下”。

在仪仗方队里,高举“八一”军旗、走在最前面的是受阅部队的军旗手宋月强。“龙头”怎么摆?“龙尾”怎么用?宋月强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直接关系到身后的 42 个方队。而且,在正常的气候下,军旗温顺如羔羊;可在风雨中,军旗重达二三十斤,像匹纵横驰骋的烈马,常人难以驯服。

为了练就超一流的掌旗动作,宋月强自制了一根钢管,灌满沙子后重达 17 公斤,他反复练习 45 度角旗杆定位动作,一打一收,一练就是两个小时。这是一位新华社记者当时在宋月强的宿舍看到的情景:3 根练坏的旗杆放在墙角。宋月强那双粗壮的大手血泡片片,双臂举肿了,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住,体重也一下子减少了 6 公斤。再看皮鞋,他专门加钉了两层鞋底,8 个大号铁掌,比原来增加了一倍的重量。正是通过这样顽强的训练,宋月强终于使旗杆在他手中运用自如,甚至可以根据不同风向甩旗、端旗、展旗,把误差减少为零。

(摘自《国际先驱报》)

●穷人也能享受的待遇

《魏书》卷六载,北魏显文帝曾发布诏令:“朕思百姓痛苦,民多非命……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给之。”后来魏宣武帝又命太医署,“于闲敞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笔者寡闻,窃以为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收治贫困患者的国立公费医院。与北朝相对立,南朝齐也设有“六疾馆”,专门收治无钱疗病的穷人。

唐代前期,由佛寺创办的“悲田坊”和政府创办的“养病坊”并存,都是免费收治贫困患者的医院,后来悲田坊都由政府接办,统一改称养病坊。据《唐会要》卷四十九载,这种收容贫民看病的公费医院,遍及各州郡,经费从指定的官田税赋中支出。宋承唐制,继续兴办这类能给贫民提供最低医疗保障的医院,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叫“安济坊”,制度上要求各州县都有一所;此外又鼓励私人集资举办慈善性的医疗机构,叫“养济院”,政府在医疗人员和药物供应等方面给予支持。

这类旨在方便贫民就医、缓和社会矛盾的公费医疗制度,到元明时代还继续存在。

(摘自《轻松为官——破解千年隐蔽秩序》)

《茶馆》的死而复生

在文革中,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茶馆》,被批判到了“满身伤痕”、“气息奄奄”的地步。记得,每次全团大会上,“军宣队”和“工宣队”的领导开口闭口就是一句话:“你们这伙子人吃饱了能干什么啊?我看也就是演演大毒草《茶馆》!这就是你们的看家本事。对不对呀?反动不反动呀?啊——?”

《茶馆》的“罪行”主要是宣扬“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有人说,剧中的资本家秦二爷是站在台上,公开煽动台下已经是公私合营的工商业者,起来反对政府社会主义的改造,实行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更有甚者,把剧中结尾处的“三个老头撒纸钱”,批判成“反动之中的反动,反动透顶”。

1979 年《茶馆》得以重见天日梅开二度。老院长曹禺动情地说:“《茶馆》是老舍先生 1957 年写成的。我记得读到《茶馆》的第一幕时,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要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了好作品的心情。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如此众多的人物,活灵活现,勾画出了戊戌政变后的整个中国的形象。这 40 多分钟的戏,也是可以敷衍成几十万字的文章,而老舍先生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把泰山般的时代变化托到观众面前,这真是大师手笔。”

《茶馆》的重新演出,依然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首都剧场里场场客满,一票难求。到 1984 年就已经演出了 400 多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写出的剧本里,其寿命之长、影响之大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话剧百年”里,前 50 年要属《雷雨》,后 50 年就要属《茶馆》,因为它们既经过了观众的考验,又经过了历史的考验。一位老戏剧家说:“《茶馆》是一部内蕴丰富的舞台艺术作品。它把‘人艺’在此以前的美学追求和导演、演员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功力汇集于一身;既有比较深厚的传统,又有新意;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 (摘自《新京报》)

胡适“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1942 年 8 月 15 日,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41 年初,蒋介石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1941 年 3 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蒋介石看来也是用美国政府压国民政府,他是不希望听到这些逆耳之言的。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1942 年 10 月 13 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 4 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 10 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也是胡适“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摘自《文汇报读书周报》)

日本投降仪式为何在军舰上举行

1945 年 9 月 2 日,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的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这一仪式为什么不在盟军总部所在地横滨新大饭店进行,而偏要选在这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军舰上举行?原来,这里面另有隐情。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为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并由他负责安排受降仪式。对此,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愤愤不平。他认为,海军从瓜岛一直打到冲绳岛,是赢得太平洋战争胜利的主角,现在却让陆军代表接受日本投降,这不公平。他向杜鲁门总统表示,如不能体现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他将不出席受降仪式。这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很为难。后来,由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从中调解,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让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代表盟军各国,尼米兹则代表美国,分别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签字仪式由麦克阿瑟主持,签字地点则定在海军的军舰上。

“密苏里”号当时在东京湾的停泊点,距离横滨盟军总部只有 30 海里。“密苏里”号是美国最大的战列舰之一,特别是“密苏里”号是以杜鲁门家乡命名的战列舰,而且还是由杜鲁门总统最宠爱的女儿玛格丽特给取的名字。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杜鲁门总统欣然批准了这一建议。 (摘自《环球军事》)

古代公务员的公费医疗待遇

●身份不同,各有定点医院

秦汉以来,医药事业不断进步,医在王官的制度日益完善。试以唐宋为例,作一个概观。

唐代的医药行政,隶属于礼部的祠部掌管,相当于中央卫生总署。另有隶属于太常寺的太医署,相当于中央一级的医学院,兼备医学教育和医疗组织两种功能。

以医疗服务的对象看,这些中央级的机构,各有制度划定的对口单位,如唐代制度,凡京师百署官吏、宫廷宦官宫女、南衙卫兵、各边疆民族驻京人员等,看病服药,都找太医署。尚药局除了为皇帝嫔妃、诸王公主服务外,禁军官兵的医疗也归它负责。

以上是京朝官吏享受公费医疗的情况。地方官吏吃药看病,也是沾惠于这个医在王官的体制。仍以唐宋为例,凡州府(宋时又加上“军”一级行政设置)一级,都设有地方一级的医学院,其领导和教师,既是执掌地方医药行政的医官,又是传教医学生的导师,一般多为太医署毕业的学生。地方官吏及地方官办学校的师生患病,就请他们治疗。

县一级没有医学院校,但也有县署机关医院。比如,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记载的北宋制度,县一级的官医配置,是

每 1 万户 1 至 5 人,遇缺即补。他们必须是太医院或地方医学院的毕业生,除了从事医疗活动外,还须负责收取药费、指导防疫、验发行医和开设药房的执照、处理医疗事故等一切相关事务。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清代。

这种县署医院兼医药行政管理的机构,一般多设在州县衙署的大门旁边,或者干脆就是县衙大墙的“破墙开店”,一方面承担县署官吏的公费医疗活动并受理医药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也为民众看病,乃至出诊,当然这就要收钱了。

●医药界黑幕重重

往细处寻思,高官势要们因有特权可予回报,医官们格外尽力悉心,曲意奉承,一般的官吏有病求医,能不体会彼此厚薄?这又是衙门式公费医疗的一个弊端。

还是拿两宋举例,人情处方的问题相当严重,当时太医局属下,有一个专门研制新药的机构和剂局,“凡一剂成,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癸辛杂识·别集》)。就是说,和剂局每试制成功一品新药,都被大大小小的京官和“有力者”私分了。据周辉《清波杂志》卷五记,权宦童贯倒台后抄家时,“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都是贵重紧俏药品。其来路,无非是和剂局、太医局、太府寺等等有关

部门和长官们的孝敬,正好暴露出公费医疗千疮百孔的漏洞。

宋代法律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由此又折射出诸如讹诈钱财、收受红包等医德问题,当然受害者多是小人物。因为古代各级衙署中除官吏纳入国家编制之外,还有各种杂役庶务,都由农民以徭役的形式充当。按规定,在此进入“公务”范围的特定时期,他们也得享受公费医疗。如《唐律疏议》卷二九有一则《工匠防人等疾病》的杂律说:“各类丁夫、匠人在劳作服役期间,戍边防守的人在镇戍边塞期间,官户和奴婢们在衙门服劳役期间,如果患病,该管官员不为他们报请治疗,或者虽然已报请,但主管医药的官员不予供给,以致他们缺乏救治医疗的,各处四十笞刑;如果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各处徒刑一年。”

所谓主管医药的官员,就是《金瓶梅》里的任医官之类,很难想象,清河县街里的更卒马夫或三班丁壮,能够在他那里获得与西门掌刑一样的公费医疗待遇。又前引海瑞《兴革条例》“医官察病症脉理,识药性,以利一县之疾。近多纳银为之,图差遭取利……”花钱通路子买官办医院里的编制,再将本求利捞回来,这里面对该有多少黑幕呢?